语言治理文献综述

胡悦

作者信息：胡悦，政治心理学和政治科学方法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明斋114，邮编100084。

朱萌

作者信息：朱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联系电话：15549159856，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关街道惠新东街10号

**摘要**：

**关键词**：语言治理

**Abstract**:

**Keywords**: Language governance

# 引言

语言在治理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Peter Miller and Nikolas Rose (2006) 认为正是语言通过对词汇和理论的解释，把政府的治国理念和方针进行了详尽的阐释”。换句话说，政治治理的一部分就是语言对相关问题的描述和阐释方式的发展。Warner Michael (1992) 就此观点给予了进一步的论述，指出治理不仅规定了人们所使用的词汇和语言，同时通过这些词汇和语言控制改变着人们的交际行为，借此加强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情感方面的联系。由此可见，语言在治理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构架治理过程中相关问题的论述，同时还能规范人们对语言的使用。

国外新近出现的政治语言学(politico linguistics)也告诉我们，语言与政治关系密切，语言的治理需要乃至必须体现政治的立场和政治的高度。Birgit (2003) 直接指出，语言是政治游戏中的一个“小卒”，“国家语言治理的决策往往不是由语言学家或语言教师来做出，而是由政治家来制定的”(Stemper Kathryn and King Kendall 2017)。而语言治理就是指语言或语言形式跨越不同的机构（如法律、教育、卫生），通过使用不同的工具（如书籍、法规、考试、论文）规定了不同人、群体、组织对语言的使用及其思想行为的过程(Heath Shirley Brice 1977)。

一方面，语言能为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传承服务，“语言不只是沟通的工具或教学媒介语，其中还牵涉到更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课题，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都需要语言政策的配合，得当的话，可以成为政治和经济政策成功的重要推动力”(李光耀 2013)。

例如，朱苏力对中国古代“官话”这一文化制度的特殊意义作了独到的分析，回溯了“书同文”对秦朝建构统一国家，塑造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Laitin (1977) 基于对非洲新兴独立国家国家意识的建构过程研究发现，语言政策在社会成员族群意识、国家身份，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等多个层面参与塑造一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特征。Liu (2015) 则通过语言政策的跨国比较，发现一国语言治理取向会直接影响该国的民族关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立法结构；de Vroome, Hooghe, and Marien (2013) 团队对美国移民和少数族裔的长期观察，发现语言政策和语言治理会对这些少数族群的社会地位认知、社会融入程度，乃至社会参与意愿产生显著的导向作用。

这些研究无一不揭示了语言治理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当前语言治理受到国内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有关语言治理的研究数量也日益增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 语言与国家治理（宏观）

“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Benedict Anderson 2005)。从秦始皇统一文字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从孝文帝“断北语，从正音”到隋文帝科举选拔，从宋代《广韵》、明代《洪武正韵》到清代“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民国时代“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再到新中国的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汉语拼音方案推广、语言文字信息化、语言文字法律法规体系、微语言治理等，上述波澜壮阔、传承延绵的中华语言治理历史无不表明了语言是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对象和核心构成要素。

王春辉 (2020) 指出，多民族国家通常会以不同的方式制定各类语言政策，实施语言规划，配合语言民族主义或语言爱国主义，以此巩固、发展和强化公民的国家认同。

一方面，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有利于构建民族或国族身份，加强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消除因语言差异带来的不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王振顶 (2009) 从文化史的角度指出，３个在语义上有着诸多微妙差别的官话、国语、普通话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呼，实际上表征了不同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通过对标准语的“正名”，一次又一次地修正“成文的”“标准的”同时也是线性的国族叙事；陈新仁 (2014) 认为，由于建构民族国家的需要，人们希望通过统一语言进而实现再造新国民、消弭地域保护主义和加强民族国家的认同；张建伟 (2017) 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用于规范全国方言的“标准语”和“二战”后推广“共通语”的研究，指出语言对解决国家整合和认同问题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传统理论认为，在多语言社会中，人们偏爱讲听众方言的政府代表，因为这表明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认同，即“文化标记”效应，因此方言和民族语言对于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而言，有助于加强政策宣导效果，提高官民沟通效率。

刘华夏 and 袁青欢 (2017) 从语言功能的角度提出，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便利性低于方言和民族语言，而交际便利与否是语言使用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少数民族聚居使用民族语言或者在地方使用方言更有利于政策的传达和民众的理解；如某扶贫工作队在地方上宣讲十九大精神时，采取“本地人”用“本地话”讲“本地事”的形式，收到了良好效果(郭光文 2017)；朱学佳 (2006) 在调查维吾尔族使用汉语方言词的状况后发现，在维吾尔族聚居区，维族群众之间、维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维吾尔族与汉族群众间交流通常使用维语，国家机关在执行公务、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在进项宣传时，亦是如此； [但@HuYue2020](mailto:但@HuYue2020) 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上述文化标记理论的替代机制——“权威标记”效应。他指出，在该机制中，政府将官方语言指定为政治权威的标志会影响人们的态度。“听众会将他们对政治权威的尊重投射到使用这种标记语言的政府代表身上”，表明了听众对讲官方语言的官僚比对讲听众方言的官员有更高的信任。

另外，也有学者提出警示，方言对地方保护主义以及民族语言对分裂势力的作用不容小觑，需要时刻注意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陈平 2008)；戴曼纯 and 朱宁燕 (2011) 通过解析前南斯拉夫的语言政策及规划，强调国家在处理通用语和地方语言/民族语言的关系时，应当警惕其负面效果；吴晓芳 (2016) 基于对台湾青年语言能力和母语认同的实证研究发现，带着“去中国化”使命的台湾乡土语言政策更多的是政治上的造势与考量，并提出了一系列反制语言“台独”的建议与对策。

国族的“共同记忆、历史传统、文化、价值”等要素的培育和传递，都需要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基础(Anthony Smith 2002)，国家通用语作为国家记忆和文化的主要载体一直以来受到各国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和争相推广，例如先秦的雅言、汉魏的正音、隋唐的雅韵及字样、宋元而至明清的官话以及近现代的国语和普通话等语言治理之策就一直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方言和民族语言作为力量，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既可以有效传达政治信息和推动政策目标的实施，从而提高地方治理绩效，也可以被用来实施民族分裂和种族异化、谋取不正当利益，成为民族运动领导层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戴曼纯 and 朱宁燕 2011)。因此在语言政治生活中，国家应当合理安排语言政治权力，实现语言政治权力的善治(王振顶 2009)。

# 语言与公民个体（微观）

上述研究对有关语言政策和语言治理的关注点从宏观角度出发，主要停留在其对于社会发展和国家政治秩序的塑造能力上，但也有大量的社会语言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从微观角度强调了语言治理对个体认知和群体心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例如，Hu Yue and Liu Amy H (2020) 认为语言影响着受侵略国的公众对前侵略国的政治态度，他们提出当个人精通一门外语时（例如英语），可以接触到其他国家关于前侵略国的替代性叙述，从而对前侵略者的态度比语言有限的国内同胞更为客观积极；刘华夏 and 袁青欢 (2017) 基于对不同个体语言能力差异的研究指出，语言差异会影响群体之间的相互认同，乃至形成心理隔阂，从而造成社会认知和社会判断的固化。因语言而划定的群体边界，使人们在心理和文化上对“我者”与“他者”做出判断，即对属于本群体内部的人有着较高的信任，更能相互包容和团结，更能遵守群体规范，有利于破除集体行动的困境。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Fukuyama Francis (2016) 就认为，内部互相认同度越高越团结的群体，对群体外部的人员通常更为冷漠，并且持有更低的信任，不同群体之间交流和互动程度低，导致群体边界固化，群体间矛盾频发，这要求国家制定合适的政策促进群体交流，以便实现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另外，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频繁的人口流动，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城市新市民，他们必然带来语言的接触和融合，从而导致语言地图的变更。或由于务工之需、或由于教育、或由于家庭搬迁、或由于城镇化提升，国内出现了大量的新市民或流动人口(武小军 2020)，而导致的结果之一便是对于语言地图的改变：或者是在当地语言之外形成了“方言岛”，或者是与当地逐渐接触、融合而产生了新的语言变异和变体(王春辉 2020)。因此从2000年至2019年间，学界从政治心理学和政治语言学角度针对流动人口描述的研究成果不断产生，调查地点也广泛涉及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宁波、成都、重庆、西安、乌鲁木齐等东、中、西若干一线、二线城市。[例如@MaRong2017a](mailto:例如@MaRong2017a) 、武小军 (2015) 、张先亮 (2018) 等均从城镇化过程中和城乡群体互动交融角度，印证了语言治理的心理效用。

# 语言与精准扶贫（热点）

近年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点工作。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首次在扶贫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在民族地区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2017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出台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提出“扶贫首要扶智，扶智应先通语”。2018年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印发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特别指出要面向“三区三州”实施推普脱贫攻坚行动；同年，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制定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要“充分发挥普通话在提高劳动力基本素质、促进职业技能提升、增强就业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当前，推普脱贫是我国政府聚焦于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通过语言治理实现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语言对贫困地区的治理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

王春辉 (2019) 指出，虽然语言能力的缺乏和语言上的弱势不是导致贫困的直接原因，但语言藩篱对贫困地区发展的束缚性越来越强，要注重语言政策与规划在语言扶贫中的作用。张卫国 (2020) 基于2013和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三个维度（经济、健康和精神）对普通话的减贫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普通话能力对经济贫困、健康贫困和精神贫困均具有减贫效果。

# 总结

当前国内针对语言治理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国家通用语（如我国的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或是地方方言政策。鲜有学者对本国英语学习的政治后果从微观角度展开深入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在我国还少有出现，但随着语言日益成为一种具有政治价值的社会资源，英语学习对个体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应当受到学者们更多的关注。

但我国有关英语政策的制定在政府部门领导和国家外语政策的指导下，体现出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社会发展需求和国家治理的需要(沈燕 2019)：

中央层面，1964年在国务院领导下成立了外语规划小组，由高教部、教育部及外交部、外贸部等外事部门参加，提出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纲要特别提出：“学校教育中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1978年以后我国外语教育发展迅速，特别是英语教育发展更快。1979年3月教育部关于加强外语教育的通知中提出，“语种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当前主要的任务还是大力发展英语教育”(郑晓枫 2006)。教育部于1983年将英语规定为我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必考科目之一(祁虹 and 黎宏 2004)。2001年，我国外语教育开始全面普及，教育部明确提出，“要在高校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教学”，并且尝试将英语作为非语言课程教学语言(赵蓉晖 2014)；

地方层面，城市国际化发展的不断推进使公共生活领域对英语的需求不断增加，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西安、南京等城市规划者纷纷把城市外英语和英语使用程度列入城市国际化评估指标，城市语言生活中的英语成分在持续增加(赵蓉晖 2014)，地方政府和学校的相应扶持政策也不断出台，例如上海市出资建设了一批全英语课程，很多基层政府也对双语教学给予了政策上的大力扶持，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用外语（主要是英语）交流日常生活渐为人们所接受。

与此同时，带来的管理问题也逐渐显露，引发了社会上对“英语过度使用”、“英语滥用”的质疑，进而上升到担心汉语空间被挤占、国家形象受损、国家认同减弱等文化安全层面，甚至连续多年成为全国和众多地方两会上被提议改进的问题，这些担忧大都涉及外语（主要是英语）在中国的地位问题，担心英语危害中国语言的地位或“纯洁性”而导致“汉语危机”，影响民族认同和母语的发展等((潘文国 2011)；(傅连连 2012)；(李君, 马庆株, and 黄彩玉 2012)；(陈春雷 2013))。

但我们必须承认，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考试、升学、出国旅游、招商引资等目的的驱动下我国公民的英语能力得到了快速发展，民众学习英语的热情也逐年上涨。从2019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大约有4亿多人学习英语(蔡基刚 2019年)，人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俨然成为一个英语学习大国。面对着庞大的学习群体，与之相关的英语问题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

例如，蔡永良 (2007) 从历史学角度对美国的语言教育和语言政策加以审视，揭示美国历史上的“唯英语化”教育运动及其对印第安部落的语言同化政策，以期对中国现行的英语政策提出建议；秦彦彬 (2014) 对韩国、日本、以色列、法国四个国家的英语语言政策的实施进行了研究，表达出实现英语语言政策有利于提高国家实力。

近年来，有关英语学习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引起了基于经济学视角的注意。周红 (2000) 从语言的经济价值角度阐述了英语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投资，强调语言的经济价值对我国外语教育改革的指导意义；江桂英(江桂英 2010)考察了我国英语教育的公共投资和个人投资问题,试图为我国的英语教育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徐启龙 (2010) 分析了英语在人力资本构成要素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揭示语言的经济学分析这种视角对当前我国语言政策规划的意义。

实际上，其他国家也总是不断地根据社会发展和实现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英语语言政策和规划。例如，加拿大议会于1969年通过了《官方语言法》(Burnaby Barbara 2008)，规定了英语和法语是加拿大的两种官方语言，并于1982年写入《加拿大宪法》；澳大利亚教育部于1987年颁布《语言问题国家政策》(Lo Bianco Joseph 2008)，确保英语的支配地位；日本于2002年在全国实施“培养具有英语能力的日本人”的行动计划，将英语作为授课语言来进行其他学科的教学(Gottlieb Nanette 2011)。上述政策都是为了适应英语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培养英语人才，从而为国家的对外交流和对外贸易服务，缩短本国与英美两国的差距；

综上所述，英语对当今世界的影响举足轻重，但我国学者对英语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外语学界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相对较少。即便有，大多数学者主要针对国外的语言政策及其语言治理过程进行考察，因此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学者从政治语言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角度探讨英语学习给我国带来的政治后果。

Anthony Smith. 2002.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中央编译.

Benedict Anderson. 2005. *想象的共同体*. 上海人民出版社.

Birgit, Schlyter. 2003. “Sociolinguistic Changes in Transformed Central Asian Societies.” In *Languages in a Globalising World*, eds. Maurais Jacques and Morris Michael 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7–87.

Burnaby Barbara. 2008. “Language Policy and Education in Canada.” In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ed. Hornberger Nancy H. Boston, MA: Springer US, 331–41.

de Vroome, Thomas, Marc Hooghe, and Sofie Marien. 2013. “The Origins of Generalized and Political Trust Among Immigrant Minorities and the Majority Popul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1336–50.

Fukuyama Francis. 2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 美弗朗西斯福山 | 豆瓣阅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ottlieb Nanette. 2011. “Language Policy in Japan.” In *Language Policy in Japan: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1–66.

Heath Shirley Brice. 1977. “A National Language Academy? Debate in the New Nation.” *Linguistics*.

Hu Yue, and Liu Amy H. 2020. “THE EFFECTS OF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ON PUBLIC ATTITUDE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1): 1–23.

Laitin, David D. 1977. “Politics, Language, and Thought: The Somali Experience. DAVID D. LAITIN.” *American Ethnologist* 5(4): 797–99.

Liu, Amy H. 2015. *Standardizing Diversit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Regim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Lo Bianco Joseph. 2008. “Language Policy and Education in Australia.” In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ed. Hornberger Nancy H. Boston, MA: Springer US, 343–53.

Peter Miller, and Nikolas Rose. 2006. “Governing Economic Life: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19, No 1.”

Stemper Kathryn, and King Kendall. 2017.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In *The Handbook of Linguistics*, John Wiley & Sons, Ltd, 655–73.

Warner Michael. 1992. *The Letters of the Republic: Publ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傅连连. 2012. “浅谈汉语在外语学习中的渗透与中国汉语危机.”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7(12): 186–87.

刘华夏, and 袁青欢. 2017. “边疆语言治理的挑战与转型.” *广西民族研究* (06): 8–15.

吴晓芳. 2016. “从台湾青年语言能力、母语认同看台湾乡土语言政策的成效.”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0(05): 24–31.

周红. 2000. “从语言的经济价值角度看我国的外语教育.” *浙江经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04): 59–62.

张先亮. 2018. *《城镇语言生态现状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张卫国. 2020. “普通话能力的减贫效应:基于经济、健康和精神维度的经验分析.” *语言文字应用* (04): 37–51.

张建伟. 2017. “语言与国家建构漫谈.” *语言战略研究* 2(06): 8–10.

徐启龙. 2010. “基于语言经济学视角的我国外语教育决策研究.” *全球教育展望* 39(03): 93+95–96.

戴曼纯, and 朱宁燕. 2011. “语言民族主义的政治功能以前南斯拉夫为例.” *欧洲研究* 29(02): 115-131+160-161.

朱学佳. 2006. “维吾尔族使用汉语方言词的状况调查.” *语言文字应用* (02): 43–51.

李光耀. 2013. “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学习月刊》2015年07期.”

李君, 马庆株, and 黄彩玉. 2012. “我国英语教育状况及对汉语国际化的影响.”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 (05): 93–94.

武小军. 2015. “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语言选择与变化.” *语言教学与研究* (03): 104–12.

———. 2020. “语言适应与社会顺应语言视域下对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的思考.”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9(05): 91–99.

江桂英. 2010. “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英语教育成本收益分析.” *制度经济学研究* (01): 184–94.

沈燕. 2019. “社会环境视角下中国英语教育现状述评.” *海外英语* (19): 47–49+51.

潘文国. 2011. “‘语文歧视’会引发汉语危机吗.” *解放日报*: 005.

王振顶. 2009. “语言的政治学分析.”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6(03): 75–78+82.

王春辉. 2019. “语言与贫困的理论和实践.” *语言战略研究* 4(01): 12–21.

———. 2020. “论语言与国家治理.”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2(03): 29–37.

祁虹, and 黎宏. 2004. “外语学习中的情感因素分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06): 404–6.

秦彦彬. 2014. “国外英语语言政策实施及其启示.”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41(S4): 141–43.

蔡基刚. 2019年. “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目的是什么新闻科学网.”

蔡永良. 2007. *美国的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 上海三联文化（原上海.

赵蓉晖. 2014. “中国外语规划与外语政策的基本问题.”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6(01): 1–7.

郑晓枫. 2006. “中国学校外语教育的发展.” *重庆工学院学报* (04): 169–71.

郭光文. 2017. “讲准‘普通话’ 说清‘地方语’.” *湖南日报*: 002.

陈平. 2008. “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与中国.” *外语教学与研究* (01): 4–13+80.

陈新仁. 2014. “语用学视角下的身份研究关键问题与主要路径.” *现代外语* 37(05): 702–710+731.

陈春雷. 2013. “汉语危机并非耸人听闻与汉语危机否定论者商榷.” *学术界* (04): 109-116+286-287.